

战鼓逐风浪，碧海寻丹心

探寻鼓浪屿的百年红色印迹

本报记者康森、褚萌萌、付敏

2021年初夏，鼓浪屿。耀目的阳光下，绿树红花掩映中，一幢幢老洋房里，不乏各式各样的新潮商店。

码头处，一艘双层白色轮渡从厦门岛跨越鹭江驶来。船上走下来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；看行装，大多是游客。人群中有一位老人，似乎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。身旁的人们却不知道，这位名叫林聪明的老鼓浪屿人最近频繁回乡，是为了更深入地调研岛上的革命历史。

时光倒回，91年前，沦为公共租界逾廿载的鼓浪屿，已是别墅林立。

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南国之夏，离如今的码头不远处的旧路头，一艘小小的木制舢板停靠到岸。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国人一边下船，一边机警地四面环顾，这位“商人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。身旁的人们却不知道，他要去往岛中部的虎巷8号——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，他有一个隐藏的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台风浪浪，海山苍苍。

鼓浪屿，这个东海波涛中“隐秘的角落”，这个厦门籍诗人汪国真笔下“月儿也香、琴儿也亮、海浪也多情”的优美小岛，曾在福建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一笔。浪击礁石，声似擂鼓——这鼓浪声，不仅是音乐之岛的美妙和弦音，更曾是红色之岛的革命战鼓声。

一袭微波，佯为静水而能流深

路头，是“码头”的古旧说法。这很形象，因为在鼓浪屿这座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，走到路的尽头就到了码头。69岁的林聪明这样解释。

岛东的钢琴码头到虎巷8号，在地图上是并不曲折的600余米，走起来却着实费点力气——这座海蚀小岛地势起伏不平，路也忽高忽低，时宽时窄。连生长在岛上的诗人舒婷都“经常在家门口迷路”，说那些“幽巷、苔迹”的石壁和风格各异的小楼都是同谋。

不过，林聪明对每一条巷陌都很熟悉。他头发花白，身材微胖，但目光炯炯，步伐矫健。脚力好，这是鼓浪屿居民的共同特征；因为岛上罕见代步工具，爬上爬下全靠步行。

从钢琴码头向西，沿中心商业街龙头路、市场路走着，一路可见闽南传统的红砖厝、中西合璧的小洋楼，旁边生长着苍翠的榕树，开着似火的凤凰花。

“不愧是‘海上花园’‘万国建筑博览’！”外地游客会这样惊叹。文史专家则不禁感慨：“鼓浪屿的历史密度太大了，每座建筑背后都有故事。”

走到与纵向的中华路交界处，若不仔细看，很容易忽略前方还有一个狭窄的小口可以继续走向前，这就是虎巷。1916年，一只华南虎从岛南对岸的漳州南太武山脚泗海上岛被枪杀于此，巷子由此得名。

不同于威风凛凛的巷名，虎巷在纵横阡陌中极不显眼，最窄处还不到3米宽。正因如此，1930年8月，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转移至此。当年早些时候，设在厦门岛内的机关附近出现了可疑人员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时任省委书记罗明决定转移到鼓浪屿，寻找一个新的住所。

虎巷8号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站在巷子里，只能看见楼的侧立面，建筑布局、屋内活动都不得而知。走进大门，才看得出这是一幢二层砖木小楼，通往二层的楼梯另设在院门口右侧的一小房内，相对独立。

如今，这座南洋华侨私宅经修葺后，成为岛上的红色教育主题馆。不过林聪明还记得2014年，这里仍是民居。当时，退休一年的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鼓浪屿的文史研究中，租住于此的友人邀他前来小坐。基于自己对鼓浪屿建筑的调查，林聪明觉得这座老宅在全岛1000多幢老建筑中“很一般”，但却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。“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保护公共租界时期留下来的历史风貌建筑，更要关注早期共产党人留下来的红色印迹。”

研究鼓浪屿的红色印迹，首先都会想问：为什么省委机关要设在这里？为什么是在鼓浪屿？

历史上，曾叫做“圆沙洲”的鼓浪屿风高浪急，人迹罕至，一直处于中原



虎巷8号的福建省委机关旧址，现为鼓浪屿红色教育主题馆。(受访者供图)

主流文化视野之外。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，根据中英《南京条约》，厦门于1843年11月成为通商口岸，与本岛一水之隔的鼓浪屿也随之开启了近代屈辱史。1902年1月10日，清政府被迫与10个国家签订《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》，鼓浪屿遂沦为近代中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。到省委机关迁至此的1930年，岛上已有十余个外国领事馆了，洋行、教堂、公馆等更是不计其数。

租界虽是外国列强殖民统治的区域，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在白色恐怖氛围下，这里却有利于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。此外，“鼓浪屿当时已是中华传统文化、闽南民间文化、西方文化等高度融合的国际社区，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也适合地下党生存，相对比较安全。”文史专家龚洁介绍。

省委机关搬到虎巷8号后，十几位工作人员对外宣称是来厦经商的一家人。罗明及夫人谢小梅是哥哥和大嫂。扮演佣人的郭香玉，其15岁的儿子黄若章任省委交通员，每天会到厦门市区一个秘密联络站，沟通文件消息。

不久后，省委军委书记蔡协民及妻子曾志搬进岛东北福州路127号二楼，这里也就成了省委军委机关所在地。这座五层小楼依岩壁而建，从面海的客厅可以远眺进岛船只，屋后有多个边门通道方便撤退，从楼背后高差近20米的鼓新路来看又仿佛是一层平房，少有人知可从此处直达海边。正在是楼下不远处的黄家渡一带海边，蔡协民和罗明每周定时约见，像两个朋友散步交谈一般，完成军委对省委的汇报和请示。

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从这两处隐蔽之所，一个个指挥全省革命的命令发出，一次次引领武装斗争的号角吹响。

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当时的厦门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区域。自十九世纪中叶厦门被迫开埠通商以来，海轮运输、电话、邮电、罐头等诸多企业在此迅速兴起。

1926年春开始，福建各地陆续建立起地方党组织。但第二年即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，革命形势严峻。当年12月1日，党中央致信闽北闽南两特委，指示要成立省一级党组织，指出：“福建的产业工人成分固属极少，但厦门福州的海员市政码头船厂等工人运动党亦始终未尝予以注意……福建临委必须建立于厦门工商业发达及交通便利区域”。在革命低潮期，这为福建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。几天后，福建临时省委成立，机关随后迁驻厦门。

“当时的厦门与中央红色交通线密切相关。”文化学者吴永奇介绍，从上海乘国际邮轮，沿海岸线到汕头和香港，辗转可到达闽南西线，这条交通线曾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沟通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；作为沿途一站，厦门港对保障整条线路畅通有着积极意义，这也是省委机关设于此的原因之一。

此后，在鼓浪屿上先后秘密召开了中共福建省第一、二次代表大会。1930年2月，在内厝澳路449号曾家园里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上，通过10个决议案，对指导全省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，但同时也作出“福建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”的前途判断，提出实行“全省总暴动”的任务。这是受到当时党内滋生的“左”倾思想的影响，过分估量了福建的革命形势。随后发动的一些公开集

会暴露了部分同志的身份，也间接导致当年8月省委机关转移到更为隐蔽的鼓浪屿上。

纷繁的战火里，地下党员们在一派汪洋中“闪转腾挪”着。历史的巨轮，就这样曲折地，乘风破浪地，向着远方驶了出去。

万国租界，洋装在身而心许国

在林聪明看来，鼓浪屿可能只是中国革命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，“这段历史很短，但它不可忽视”。

1931年3月25日，省委机关迁到虎巷8号不到一年后，遭国民党当局破坏，军委机关也被迫撤离。此后，党中央据情决定暂不恢复福建省委领导机构，分设福州、厦门两个中心市委。原本就处于隐蔽战线的鼓浪屿革命活动，变得更为艰难而隐秘。但是，救亡图存的红色脉络，在小岛上从未断绝。

只是，那些在当时就藏得越深越安全的往事，如今显而易见的更是寥若晨星。林聪明寻找着，终于在故纸堆中认识了一位革命老人何加恩。他在鼓浪屿上求学、教书、入党，还以诗歌写革命史，让人可以透过诗意一窥当年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的地下斗争——

“在晨曦中，日光岩升起一面红旗/镰刀与铁锤，压倒反动派的旗帜/岩下远近的洋楼窗口，有无数的人在瞭望红旗/祖国一定胜利，人民跟共产党站在一起！”

日光岩奇石叠垒，洞壑天成。登临极顶，可俯瞰全屿，远眺鹭岛。在何诗中，1932年，为了鼓舞群众，革命者们“神不知、鬼不觉”地在这凌空耸立的数十米巨石上，举行了一次特殊的“升旗仪式”。

曾任厦门中心市委执委的何加恩，和其他同志守在岛上的一个重要联络站，就是泉州路54号——神州医院。从1932年到1934年，这里掩护了众多地下党员，营救了不少进步学生，还为苏区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。

医院的开设者李应章，是一位台湾籍医生。他曾领导全台湾第一个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农民斗争——二林蔗农事件，后险遭日本当局逮捕，避走厦门，在鼓浪屿行医谋生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他任神州医院党支部书记，以医生的身份从租界方面搜集情报。可惜两年多后，由于叛徒泄密，李应章再次撤离，辗转抵达上海，继续支援革命。

其实，在鼓浪屿，海峡两岸共享的爱国记忆开始得还要再早一些。那是在明末，郑成功屯兵于此，演武整军，借着台海雄风，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38年的台湾。岛东南现今矗立一巨型郑氏雕像，似乎仍在凭崖御浪，观之不禁吊古抚今。

滚滚浪涛从深水的厦门港流经台湾，流往海外，也在近代席卷着革命的双鲤从大陆流向远方。文史专家彭一万介绍，当时党在鼓浪屿的工作，为国内革命争取到海内外更广泛的支持。

兴实业以救国的黄奕住、不愿降日而避祸苏岛的林尔嘉……自此近代诸君以降，鼓浪屿上不乏港澳台侨胞的爱国印迹。岛上的华侨文化展馆内，陈列着华侨王雨亭写给其子王唯真的一封“抗日家书”——

“不能因为‘砥牻之爱’而淹没了



厦门鼓浪屿全景。

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

艰难。但它仍发着光，且越来越亮。

满目盛景，血色传奇来路维艰

在文教宣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，林聪明还是喜欢称自己为“三丘田农民”。他成长的三丘田位于岛东北，是一个依海而生的聚落。父亲是船工，年少时的林聪明还会摇着舢板，帮忙在厦鼓两岛间运载乘客。

鼓浪屿周边滔滔汨汨，看似波澜不惊，但可能暗潮澎湃。岛上的人们自古驱涛为犁，耕洋为田，似乎这里的革命事业也带着点海的特性。在鼓浪屿的隐蔽战线，斗争往往激烈得悄无声息。

1949年秋，这里的旗尾山成为解放军登陆厦门的第一站。此前，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相继解放了福建多地，国民党军队集结三万多兵力退守厦门。战斗的关键，就是佯攻鼓浪屿以吸引国民党守军。

10月15日，闽南的秋日，海面风平浪静。夕阳落后，战斗打响，不料突起大风，吹乱了进攻的舰队。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，承担该作战任务的解放军第31军271团遭受重大损失。团长王兴芳带领部队在旗尾山海边强行登陆，展开殊死搏斗，最终歼敌一部，我部伤亡严重。10月17日，厦鼓二岛宣告解放，王兴芳等1000余名将士英勇牺牲，几十名支前船工献出生命。

父亲告诉林聪明，当年战斗结束时，他摇着舢板帮助解放军收殓遗体。不少烈士牺牲后，腿还深陷在滩涂中；潮水涨上来，好像仍直直地站着。

王兴芳就葬在了当年的战场。据说，他曾交代战友，如果牺牲了要埋在鼓浪屿，“面向台湾，看着台湾解放”。这座因明郑水师插尾旗于此而得名的山，后来更名为“英雄山”。每年清明，山上木棉花开，红彤彤一片。

如今，漫步鼓浪屿，不时会偶遇当年国民党修筑的钢筋混凝土碉堡。据林聪明调查，现存共28座，日光岩顶游客的观景平台就是其中一座。

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两岸紧张对峙的年代，厦鼓二岛仍处于斗争前沿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林聪明在前身为英华中学的厦门二中读书时，就是学校的武装基干民兵。他还记得，那些站岗放哨的夜晚，伴着风声水声，总能清晰地听到金门岛的喇叭声。

数十载过去，硝烟消散，昔日对峙前线也渐转为两岸交流前沿。二中的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参加的不再是战服团、民兵连，而是丰富的文体活动，今年初成立的红色讲解队就是其一。四五十名中学生将从这个暑期开始，为游客讲解岛上现存的八处红色遗迹。

本学期的初，一听到要成立讲解队的消息，曹暄同学立刻就报名了。“‘红色’这个词很打动我。”她说，“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石。”

选拔很激烈，报名的有一百多人。二中副校长周毅说，虽然时间已远，但身处英华校园，孩子们在空间上离革命的历史很近，因而总会有特别的感触。

曹暄的家并不在鼓浪屿。她一开始觉得，在这样美丽的旅游区读书仿佛是很浪漫的体验，直到入学后才逐渐了解到那浪漫背后的曲折与激荡。“我想通过我的讲解，告诉更多人那段深刻的历史。”

的确，鼓浪屿太美了；那红砖白墙，那绿树红花，美得像是个浪漫的传奇。浓墨重彩间，人们险些忘了现实曾经的残酷与灰暗。

例如，在岛上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，据传就是伪装成一场婚礼。在中西合璧的小楼中，代表们打扮成前来贺喜的宾客，还煞有介事地放鞭炮、发喜糖。可是，那是在城市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破坏的戒严环境中。这一所谓的传奇，只是迫不得已的安排。喜庆之下，是生与死的紧张。

究竟是因为什么，一波波共产党人明知可能会牺牲，还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？林聪明觉得，研究革命历史不只是讲故事，重要的是关注历史背后的人，关注共产党人的精神——

曾前后五次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，在这一曾出过叛变者和潜逃者的艰难职务上，任职时间最长，历经血火考验；曾任代省委书记的王海萍及妻子梁惠贞，均家境优渥，但为了信仰与出身的阶级决裂，双双英年牺牲；曾任省军委机关秘书的曾志，为了革命送出过三个儿子，两位伴侣也先后捐躯……

“回顾这段历史，仿佛就是与革命者对话。”林聪明说，“他们相信，坚持下去，总有人会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”这是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信念。

而功力必不唐捐。时空流转，潮涨潮落，三角梅谢了又开，一度时髦的拉毛白墙在风吹日晒中逐渐斑驳。曾经的公共租界已是满载厚重记忆的世界文化遗产，游客来此缅怀纪念，也来此休闲娱乐。虎巷8号的大门再也不用紧闭着；它大大地敞开，倾吐着艰辛的往事。老校园来了新面孔，但年轻的声音却依稀没变。

总有一些人没有忘记。总有一些事不应被遗忘。

在龙头路53号，启新书店旧址上，一间小小的书店今年7月1日“重新启航”。店主是37岁的鼓浪屿人洪家士。他说，书店将主营红色书籍，仍然延用那个令人神往的名字。其实，在这个门牌号上存在过许多店铺，启新书店的四个月，在时间上不算什么；而且，在旅游区卖书可能赚不了什么钱。不过，洪家士总是想起他的同乡，那位为了启新书店而抵押掉房子的黄猷。一这么想，他就觉得做得很值，“人总要有点情怀”。

洪家士特意去了趟厦门岛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林华。老人听后很开心。

启新书店旧址，是二中学生将要讲解的八处红色遗迹之一。可岛上的红色印迹，远远不止八处。在那段隐秘的历史中，一定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伟大。

广袤蔚蓝中的这个小岛，它地处偏远，却从未偏安；它文艺十足，却不失热血；它弥漫着异国情调，却怀揣一颗爱国心；它风景如画，但最美的风景，是那些曾经前赴后继的身影。

在鼓浪屿，沿袭闽南传统，很多房子都是用清水红砖建成的。听说，这种砖，雨打风吹下，年岁愈久，就红得愈深。